

ZHONGWANTANG WUDAI KEJU YUSHEHUI BIANQIAN

中晚唐五代

科举与社会变迁

金滢坤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晚唐五代

科举与社会变迁

金滢坤 著



② z w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金滢坤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01-008071-0

I. 中… II. 金… III. 科举制度-关系-社会变迁-研究-中国-唐代~
五代(907~960) IV. 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906 号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

ZHONGWAN TANGWUDAI KEJU YU SHEHUI BIANQIAN

金滢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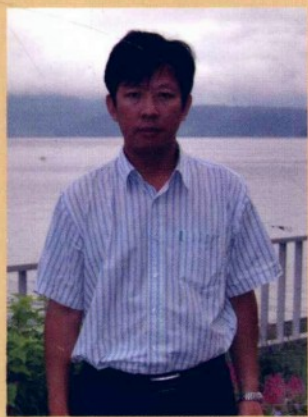
字数:3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071-0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新华书店
PDG



金滢坤，男，1972年生，甘肃白银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先后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敦煌学硕士和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正大学文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和人环总学部进行合作研究、访学。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科举制度史和敦煌学研究，曾在《中国史研究》、《文献》、《民族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月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或摘编。与郝春文教授合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四、五卷）。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北京市优秀人才专项经费资助D类项目“晚唐五代宋初科举与社会变迁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敦煌寺院行文书辑校与研究”。参加国家重大项目“中华大典·经济典”、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敦煌文献合集·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的编撰工作。



序 一

韩 昇

金滢坤来到厦门大学求学，是我接待的。他打算学习的是隋唐史，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史，首先是一部乡间史，必须对中国的农民和农业有深刻的了解，至少也必须怀有理解的同情，才能知其真髓。所以，我非常欢迎和重视来自乡村的学子，金滢坤恰好来自西北农村，家乡又是唐代边防和民族交错地区，如果将这些自身条件融入唐史钻研之中，把潜能发挥出来，将成为研究上的长处。初次交谈，了解他在硕士阶段所作的研究，知道他已经在唐代社会史方面下了不少苦功，有了相当的基础。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金滢坤结实而憨厚，口讷而谦恭，对学术颇怀虔敬，不畏艰苦，只言片语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执着追求的顽强精神和青春活力。我的这点印象，和他以前的几位导师的看法相吻合。

对年轻学子而言，在功利而喧闹的城市里做古代史的研究，不但生活艰辛，还有出路茫然之忧。我自己也曾经负笈求学，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深知异乡学子之难。所以，我颇为担心金滢坤能否坚持得住。在研究生当中，因为情绪波动造成学习上起起落落的情况，既多见，也可以理解。可是，金滢坤好像有免疫之力，每天都那么平静地来到图书馆，阅读，做卡片，从不松懈。平平淡淡最是不易。

淡定就越发能够沉思，问题便被一个个发掘出来。在博士三年期间，金滢坤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他总能捕捉到新问题，并力图去考证解释。那时候还没有博士期间必须发表若干篇论文的指令性规定，这些文章是在阅读浩瀚史料时产生的一得之见，显示出他对于学术的敏感，可能考虑不一定周全，却有一股开拓和探索的朝气。

发表多篇论文之后，金滢坤对学术研究更有自信，研究方向也日益明确，他计划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考察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隋唐王朝留给后世的遗产颇丰，科举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以往对于科举制度

的研究，多将它作为一项考试制度乃至官员铨选制度的重大变革来研究，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研究，关于这些研究，金滢坤在本书中作了很好的介绍与概括，不劳我在这里絮叨。就制度史的层面而言，唐代科举制度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很难再有大的进展。

然而，跳出制度史之外，从隋唐史的角度，甚至扩大到中国史、东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隋唐科举制度，就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于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发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需要研究的地方还很多。改变角度看看，调换角色想想，老问题顿生新意，历史的天空还是那么宽阔。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变换角度看问题并不是随便都能做到的，那其实是研究深化的结果。

金滢坤最初选择的是做中晚唐科举制度的研究。因为他不愿人云亦云，想自辟一片新园地。虽然中晚唐的史料缺漏很多，时局复杂，头绪纷繁，把握起来不容易，但他有这个思想准备，跃跃欲试。我也觉得有必要大力加强中晚唐乃至五代史的研究，希望能有一批青年学者勇于挑战，撑起这个领域来，所以非常赞成他的选择，也关注他研究的进展。

他先是系统阅读了中晚唐的文献，全面收集科举制度的史料，完成面上的研究。这时，他形成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从社会阶层的变动去考察科举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考试制度，或者官吏铨选制度，而具有很大的社会指向性意义。仅从制度方面来看，唐代科举一年录取的进士不过数十或者百来人，从数量上看似乎无足轻重。然而，为了争得一个进士出身，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子投入这场选拔。就当时的教育状况而言，参预科考者几乎涵盖了整个士人阶层。因此，科举考试成为整个社会教育的指挥棒，左右士风，进而影响世风。这是科举制度第一个可以直接看出来的社会影响。其次，科举制度成为士子出世的主要通道，驱使想跻身仕途的人无不趋之若鹜。自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形成了一个颇为强大的士族门阀社会。其坚固性源于城乡一体的结构：大族聚居，左右地方政治，其家族头面人物据此进入中央权力中枢，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柱，城乡呼应，互为表里。这就是士族门阀政治长期保持的根本原因之一。要解消士族门阀政治，首先必须切断士族的城乡一体结构。在这里，科举制度恰好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每年的科考，不断将在乡大姓的精英分子吸收到城市来，极大地弱化了在乡士族。第三，科举带来文化的集中，加快人才和资源向城市聚集的进程。这一进程进一步打破士族城乡一体化结构，带来唐中晚期社会的质

变。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形态，在唐前叶的和平发展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化，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来考察科举制度，同中晚唐社会的质变结合起来，是一个富于挑战且颇具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如果没有把科举同整个社会的变化结合起来，是难以揭示科举制度的社会意义的。金滢坤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度是导致唐宋社会变革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治学者最容易忽视的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之一。从科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角度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更有利于探明科举制度中的许多历史难点，并揭示该时期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

这并非一般性的泛泛之言，而是对于科举制进行多方位深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同时也表明科举制的研究正在突破以往的范围，同社会史、文化史等紧密结合，从而开拓更多的研究空间和视角。

金滢坤作的这项研究，费了很多心血，书中具体的考证就不多说了，收录的多个表格，不但加强了考证，而且也具有工具性质，非常有用。这些表格，来自大量的数据统计，在此基础上还必须作更进一步的辨析考证，有时真是历时多年，难有寸进。从开始这项研究至今，这些统计数据在不断地接受检验和修订，到最后定稿，竟花了十年的心血。

读完这部书稿，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金滢坤当年的样子，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毫不松懈。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了。人说十年磨一剑，此之谓也。



序 二

刘海峰

从隋炀帝创立进士科之后，到唐代，科举制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考试的内容日渐丰富，考试的条规趋于繁密，科举在社会上真正占有了重要地位。唐代是科举制的奠基期，宋以后各代科举内容、形式、场次乃至相关的科第习俗皆从唐代科举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从唐代开始，科场真正形成，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有了一个关键的场域。从此，科场风云变幻与政坛起伏、学校兴衰息息相关，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段科举经历，多数政治家通过科场登上历史舞台，科举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

中唐是唐代科举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也是科举人才辈出、科场事端频仍的一个时期，这是唐代进士科的黄金时代，其表现一是进士出身位极人臣者所在多有，二是进士科拔取了许多著名的才学之士。此时期科场风云变幻多端，风波迭起，出现了关于科举存废的高层次大规模论战。到晚唐时期，大唐帝国日趋衰弱，科场也少有盛唐、中唐时人才辈出的蓬勃气象，而出现了江河日下的趋势。科举取士二百余年之后，种种问题层累积淀下来，因而晚唐科举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和争斗。具体而言，主要有经术与文学之争、子弟与寒士之争、科举存废之争，这些争论或争斗又多与科举朋党之争交错在一起，因而相当复杂尖锐。不过，晚唐科场也非漆黑一片，在制度演进方面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时期，除了后梁有三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两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每年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科举制是一个影响广泛的制度，“科举学”是一门发展迅速的专学。在中国

科举史的研究中，唐代科举研究以往成果较多。但是，近年来，相对明代、清代等其他发展迅速的断代科举研究，唐代科举研究显得较为冷清。或许是已有研究成果丰硕、史料较少、突破不易的缘故，现在研究唐代科举的学者偏少，这从每年举行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在唐代科举研究中，晚唐和五代科举又是以往研究得较少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对五代十国科举制度的研究更是薄弱。难能可贵的是，滢坤博士近十年来，专注于中晚唐五代科举研究，成果丰硕，新论迭出。他认为，科举制度作为唐宋变革时期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对人类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度是导致唐宋社会变革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治学者最容易忽视的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之一。从科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角度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更有利于探明科举制度中的许多历史难点，并揭示该时期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对国家官僚政治、选举观念、婚姻观念、社会阶层、士族中央化、学术思想发展、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对唐宋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的转移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变迁影响巨大而且深远。滢坤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今修改充实成书，不仅更为系统深入，而且花费巨大心力对中晚唐五代擢第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逐个考订和统计分析，包括其中的“中晚唐五代知贡举人名职官表”、“中晚唐进士科出身者入幕方镇分布简表”等都颇具学术价值。

古人治学提倡“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滢坤博士在硕士阶段专攻敦煌学，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博士阶段在厦门大学跟随韩国磐师和韩昇兄，专治唐五代史，毕业后又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参加了龚延明先生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人名录》隋唐五代卷的编撰工作，具备了扎实的史料功夫。他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便与我多所切磋，近年来因研究专题靠近，在科举学会议上也时有机会见面。今见其大著《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即将面世，作为以研究唐代科举起家的同门同道，尤为欣喜，是故聊草数言，以表祝贺之情。

2009年6月1日

目 录

序一	韩 昇 (1)
序二	刘海峰 (1)
绪论	(1)
第一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程序的完善与变革	(13)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的乡贡	(13)
一、中晚唐五代乡贡与冒籍	(14)
二、中晚唐乡贡与取解制度的逐步完善	(35)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锁院制度的确立	(45)
一、中晚唐五代锁院制度的确立	(46)
二、中晚唐五代锁院制度的逐步完善	(49)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中书门下省复核和覆试制度	(58)
一、中晚唐五代中书门下的复核制度	(58)
二、中晚唐五代中书门下的覆试制度	(61)
第四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监察制度的初步设置	(64)
一、中晚唐五代惩治科场的违纪行为	(65)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弊制的革除	(69)
第二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省试与社会变迁	(73)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的省试试官	(73)
一、中晚唐五代的省试知贡举	(74)
二、中晚唐五代礼部省试主司的社会出身分析	(78)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82)
一、唐代别头试的产生与子弟问题的出现	(82)
二、中晚唐科场覆试案与子弟之争	(84)

三、晚唐五代子弟之争的淡化	(99)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	(104)
一、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	(104)
二、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的产生与科场风气	(110)
三、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	(125)
第三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选官制度的变迁	(138)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与铨选的关系	(138)
一、唐前期科举与铨选的变迁	(138)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与铨选变革的关系	(148)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162)
一、中晚唐科举与清望官的相关数理分析	(164)
二、中晚唐科举对清望官选任的影响	(171)
第四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人幕的关系	(176)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铨选制度变化对及第举人入幕的影响	(177)
一、盛唐铨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入仕的关系	(177)
二、中晚唐铨选制度变化与及第举人入幕的关系	(179)
三、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与升迁中央官的关系	(186)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的选择与程序	(189)
一、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风气与方镇辟府标准的关系	(189)
二、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对使府的选择	(197)
三、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与方式	(205)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对藩镇的影响	(215)
一、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与使府唱和的关系	(215)
二、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与乡贡、行卷的关系	(221)
三、中晚唐五代科举及第举人入幕与维护中央统治	(222)
第五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	(229)
第一节 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	(229)
一、唐前期的婚姻观念简述	(230)
二、中晚唐五代婚姻观念的变迁	(231)
三、中晚唐五代婚姻观念变迁的原因	(235)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榜下择婿风气	(239)
一、中晚唐五代榜下择婿风气的形成	(239)
二、中晚唐五代榜前择婿的出现	(241)
第六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变迁	(244)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阶层的变迁	(244)
一、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阶层的升沉	(246)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的经济特权与社会阶层变迁的关系	(259)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大士族的变迁	(267)
一、中晚唐五代进士科与若干大士族的仕宦关系	(267)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关系	(277)
附录	(286)
附录 I：中晚唐五代宰相人名与出身简表	(286)
附录 II：中晚唐五代知贡举人名及职官表	(299)
附录 III：中晚唐进士科出身者入幕方镇分布简表	(311)
主要参考文献	(320)
后记	(331)



绪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在寻求选贤用能的选举制度，以培养和选拔适合不同社会统治形态的官员，进而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官僚体系，以服务于相应国家体制的需要。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即国家形态形成的初期，中国统治阶层就非常注重对“公卿大夫之子弟”的培养，设立庠塾、黉学，分科培训经国治世之术，“设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而后入仕^①。

西周时期，已出现“乡举里选”的选贤制度，按人材贤能的不同，分为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四等^②。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各诸侯国竞相变法，公卿王侯养士之风大兴，“举贤才”的观念广为统治阶层所接受，世卿世禄的旧制逐步改变。随着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出现，孔子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选拔官僚的观念^③，为后世中央集权国家选贤用能提供了理论支持。

秦汉时期，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形成，分封制已经不能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按贤能选举国家官僚便成为时代趋势。西汉从高祖刘邦时就曾下诏求取“贤者智能”之士^④，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⑤，标志着察举选士制度化、规范化，成为汉代一条较为完备的选官途径，也是中国选举制度史上设科选士的开始。东汉沿用察举之制，在贤良方正、孝廉科之外，增设秀才、明经科，将考试引入察举制，开启了非等额考试录取之端绪，察举制已向科举考试制度迈出了重大的一步^⑥。察举制度也因此与征辟制度一起成为了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

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之法”，与门阀官僚政治相适应，由于郡县长官掌握着举荐权，士族累代垄断了秀才、孝廉，于是出现了察举士族化的现象，使

① 《通典》卷13《选举典一》，第308页。

② 《通典》卷13《选举典一》，第309页。

③ 《论语今注·子张篇第十九》，第425页。

④ 《汉书》卷1《高帝纪一下》，第71页。

⑤ 《汉书》卷6《武帝纪六》，第160页。

⑥ 参考刘海峰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第8—14页。

士族子弟“安流平进”坐至公卿^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朝察举制的试策考试程式逐渐严密化，“以文取人”的原则亦趋强化，秀才、孝廉与举主的关系疏远，自由投考制度萌芽；与此同时，北朝北齐时，士族独占秀才之途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这些无疑为以招考和投考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诞生创造了条件和基础^②。

九品中正制毕竟只适应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它仅保障了地方士族的政治利益和仕宦权利，并不符合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利益。随着空前统一的隋帝国的出现，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是建立在削弱地方士族势力的基础之上的。隋文帝在收归吏部铨选对地方官吏选举权的同时，还必须创建一个新的选举制度来取代“以族取人”的察举制度，彻底收归中央对国家官僚的绝对任免权。于是，专制皇权便有意选择打破维护士族利益的察举制，充分利用和发掘察举制下试策考试公平竞争的因素，并打破了“以族取人”的门户界限，日渐公平的考试制度在客观上又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抑制了士族门阀势力，使官僚体制不断注入“新血液”，从而巩固了皇权的稳固。因此，以行政技能为考试标准的科举制度，便成了皇权抑制军功门阀新贵、选拔官僚队伍的最佳选择。科举制度遂“构成了士人加入帝国政府的制度化渠道”^③。

隋文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在此基础上，科举制度在唐初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武则天时代科举制得以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科举制度对关陇集团军事贵族的抑制目的。唐代科举制度不仅将地方世族中的精英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而且将中小地主、士农工商、胥吏子弟中的精英吸收到国家官僚体系中，扩大了社会统治的基础，提高了帝国的行政效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深层意义上看，科举制不但具有打破门阀政治、提高官员素质的作用，而且具有促进社会阶层变动与使社会发展趋向均有重要意义”^④，有力地冲击了魏晋以来的官僚贵族政治，彻底瓦解了地方世族势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作用最大，科举取士最终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选官途径，基本上打破了“以族取人”、门荫入仕的观念。

科举制在宋、元时期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宋代，国家通过科

① 参考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151—214页。

② 参考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248、279页。

③ 阎步克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3页。

④ 韩昇师《科举制与唐代社会阶层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第24—26页。

举取士，彻底地打破了贵族门阀官僚政治，建立了以科举为调控杠杆的国家官僚政治，增强了国家控制、维系国家官僚体系的能力^①。明清之际，科举制逐步走向僵化，“八股取士”束缚了人性自由，因其改革滞后，最终被时代所抛弃。“科举制像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②。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项官僚选拔制度，为历代帝国选拔了大量精通政务、饱学诗书的社会精英，构筑了国家官僚体系的主干力量，从而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构建了皇权和士大夫阶层的和谐，使帝国最大程度地笼络了社会精英，效忠中央皇权。

尽管明清以来科举制度走向了没落，但是科举制度在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晚唐五代，无论在考试选拔人才方面，还是在社会诸多层面的影响方面都是积极向上的，对中晚唐五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科举与铨选制度变迁、新兴官僚阶层的出现、士族向城市迁徙、社会阶层的变迁、朋党之争、座主门生关系、子弟之争、进士朋甲、及第举人入幕等诸多问题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经济上，衣冠户的出现、科举冒籍、学生减免课役等都与科举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文化上，科举与国家学校教育体制的变迁、民间乡村教育的变迁、婚姻观念的变迁、文化中心的变迁、诗歌的繁荣与经学的衰落、古文运动的兴起、使府唱和、传奇的兴起、行卷之风、园林游赏、读书山林风气、书院的兴起等许多问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显然，科举制度对隋唐五代社会的影响深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因此，科举制度的研究成为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关于隋唐科举制度的研究，学者们在科举起源的时间、科举考试程序、科举与社会变迁、科举与官僚政治、科举与党争、科举与文学、科举与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相对薄弱之处。

关于科举制起源的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主要因为诸家对科举制度产生的判定标准持不同意见。刘海峰先生将科举制度起源的说法分为五类，大致概括了

① 韩国磐师《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原刊于《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收入韩国磐师《隋唐五代史论集》，第267—283页）一文认为，从唐宣宗时旧世族被打垮，以后各朝都是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其封建国家，科举制成为支持官僚政治的一大杠杆。

②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75—96页。

学术界对科举起源时间的不同看法^①：汉代初创始说^②、南北朝创始说^③、隋代创始说^④、唐代创始说^⑤、汉与隋创始兼顾说^⑥。之所以出现这些分歧，源于学术界对科举制定义的不同，大致有五种主张：“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以进士科设置起始为科举制起源”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说，“投牒自举”说，“以文取士”说^⑦。

考试程序、内容、科目等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起步较早，铃木虎雄《唐の

① 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3—15页。

② 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炎培在《中国教育史要》序言中说：“如果真要说科举的起源，该说西汉”，他的判定标准是西汉已有“分科射策”（第4页）。90年代，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认为“汉代实为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成期”（《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04—118页）。

③ 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认为：北朝后期的举秀才、孝廉和南朝的明经射策，从考试内容上，特别是从放宽门第限制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制度开辟了道路；“准许怀牒自试”为唐代科举的特点，北齐已经看到科举萌芽了（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31页）。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认为：“梁时选举，从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九品中正制的刊革，科举制的产生。”（第233页）

④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说是学术界的主流说法。20世纪30年代，周谷城《中国通史》认为：“科举制，盖取分科目而举士人之义，这个制度创始于隋炀帝时代。”（第472页）40年代，宫崎市定著《九品官人法研究》认为开皇十五年（595）为科举制度的起源，开皇七年制诸州举人为科举之始（第519—520页）。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第4页）、高明士《隋代的教育与贡举》也主张进士始于开皇七年（收入《唐代研究论集》第4辑，第177—252页）、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册等均认为进士科始于开皇七年（587）（第13页）。韩国磐师《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认为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应已出现了进士科（收入韩国磐师《隋唐五代史论集》，第294—297页）。王凤喈《中国教育史》（第126—129页）、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第67页）、余书麟《中国教育史》（第522页）、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第9页）、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第211页）等论著持大业二年说，曾我部静雄《中国选举、贡举与科举》（《史林》53卷4号，1970年，高明士译文见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402—442页）、胡美琦《中国教育史》（第260页）持大业年间说。

⑤ 邓嗣禹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1934年第2卷第1期，第275—284页，（收入《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第111—116页），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中则认为科举制度正式出现在唐代（《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98—111页）。

⑥ 90年代，刘海峰在《“科举学”的世纪回顾》一文中，认为“科举”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任官的制度，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5—23页；参考刘海峰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第7、24页；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3—15页）。

⑦ 详见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59—62页；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62—64页；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31—44页。

试验制度と诗赋》^①、东川德治《科举の制》^②、铃木虎雄《股文比法の前驱》^③、铃木虎雄《唐の进士》^④、加藤繁《封建と科举》^⑤、竹田龙儿《唐代选举の一侧面》^⑥、胜又宪治郎《秀才の辨》^⑦等论文在这些方面都发表了重要看法。此后，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P. A. Herbert “Recording and Processing Data on Candidates in the Tang Examination System”^⑧、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侯力《科举制度与唐代社会》、陈飞《唐代试策考述》、Oliver Moore “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 Reading an Annual Programme in the Collectet Statements by Wang Dingbao (页 870—940)” 等专著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⑨、大野仁《唐代进士试の试验时间について》^⑩、乌廷玉《唐代的科举制度》^⑪、刘海峰《唐代秀才科存废与秀才名目的演变》^⑫、万绳楠《武则天与进士新阶层》^⑬、余子侠《唐代秀才科考论》^⑭、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⑮、黄正建《〈新唐书·选举志〉岁举科目辨析》^⑯等论文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实的探讨^⑰。

在科举与高级官吏的选举方面，傅衣凌《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较早注意到唐代宰相的出身地与进士出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⑱。毛汉光先生《科举前后（公元 600 ± 300）清要官型态之比较研究》，利用大量

① 《支那学》第2卷第10号，1920年，第20—30页。

② 《东洋文化》第12号，1925年，第47—62页。

③ 《支那学》第4卷第1号，1927年，第26—47页。

④ 《支那学》第4卷第3号，1927年，第29—51页。

⑤ 《东亚》第3卷第10号，1930年，第69—72页。

⑥ 《史学》第20卷第2号，1931年，第15—52页。

⑦ 《东方学报》（东京）第6册，1936年，第341—356页。

⑧ 《大阪大学语言文化研究》XIV号，1988年，第143—156页。

⑨ 收入其《国史新论》，第242—263页。

⑩ 收入《东アジアの法と社会：布目潮浪博士古稀纪念论集》，第139—157页。

⑪ 《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157—161页。

⑫ 《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8—15页。

⑬ 《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93—98页。

⑭ 《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49—63页。

⑮ 《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6—85页。

⑯ 《文史》第34辑，1992年，第290—293页。

⑰ 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42—155页。

⑱ 《社会科学》1945年第4期，收入傅衣凌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85—95页。